



V V V
Report on the Frontier

Literature Research in China

卷之三

报告

中国文艺研究 前沿报告

方 宁 陈剑澜 主编

学术前沿研究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薛晓源

中国文艺研究
前沿报告

方宁 陈剑澜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艺研究前沿报告 / 方宁, 陈剑澜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5
(学术前沿研究报告)
ISBN 978 - 7 - 5617 - 5377 - 4

I. 中… II. ①方… ②陈… III. 文艺 - 研究报告 - 中国
IV. I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6539 号

中国文艺研究前沿报告

主 编 方 宁 陈剑澜

责任编辑 储德天

责任校对 申 浩

封面设计 储 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 - 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 - 62860410 021 - 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 - 62869887 021 - 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26.75

字 数 43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5377 - 4/I · 378

定 价 4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总序

2000年春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进行创刊以来的第三次改版,杂志社召开作者和读者座谈会,讨论今后办刊的方向,意见纷纭,编辑部集思广益,含英咀华,把“理论性、现实性、前瞻性、对策性”作为座右铭写在刊物每一期的封面上,作为刊物努力发展的方向。为了把握理论与现实的最佳结合点,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设专栏“前沿问题研究”,对当代西方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先后聚焦了以下专题:全球治理、全球化与风险社会、风险与安全研究、风险社会与治理、现代性问题、社会正义与社会规范、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协商民主、生态政治等,先后编译西方著名学者近200篇研究文章,很多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很多学界人士认为把握当代西方学术前沿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的最大特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教授独具慧眼,玉成出版社与杂志社合作,推出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第1辑6本,由俞可平教授主编,我任副主编。包括《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论丛出版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版社和杂志社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双赢。

事情总是辩证的,接下来也遇到不少问题:我遇到许多作者和读者,尤其是学界同仁的不断的,但是善意的追问:什么是前沿问题?如何把握和研究前沿问题?说实在的,这问题在我担任杂志执行主编的第一天,我就不断在心里追问自己。自己也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可惜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089页是这样界定“前沿”的。“‘前沿’,名词。1. 防御阵地最前面的边沿;2. 比喻科学研究中心最新或领先的

领域。”虽然解释比较简单,但是我认为《现代汉语词典》对“前沿”的解释还是搔到了痒处的。

我又从网上按“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研究”专题查询,谈论这个问题的条目有15万6千多条,真正从正面界定和阐释“前沿问题”内涵和外延的文章却不多。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发现谷源洋先生在《前沿扫描:世界经济研究》一文中正面解释和界定“前沿问题”。他说:“所谓前沿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和社会迫切关注和需要研究的问题;二是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重大问题;三是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难点问题。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学者提出的‘中国输出通缩论’、‘人民币低估论’、‘中国商品冲击论’以及‘中国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论’等论调,都是我们国家和社会民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和学者能从实际出发,给予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视为前沿问题的研究。”谷源洋先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答什么是前沿问题,我认为切中肯綮,但是在内在属性论述上还是过于简略,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我想从“前沿问题”所应该禀赋的属性来界定:

1.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具有学术前瞻性。我讲一个故事来说明什么是学术前瞻性?我在德国慕尼黑大学采访社会学家乌·贝克教授,就“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风险社会”理论创始的关系,向贝克教授发问:在《自由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您说在爆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时,您正在审阅《风险社会》一书的清样,西方许多学者包括中国有些学者都认为是这次核事故触发了您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及写作《风险社会》这本专著。事实上不是这样,早在核事故之前,您就已经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写作了这本专著。我们想知道的是,在这之前,是哪些现实问题触发您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写作《风险社会》这本书?

贝克教授是这样回答的: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新表述,我提出风险社会的构想。这个风险是现代乃至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的核心,它将取代诸如财富、科学、理性等因素而主导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开展。风险社会基本上是以对工业社会现代化的批判为着眼点,通过扬弃线性的、简单的“第一现代性”(或“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出自我批判、解决难题的“第二现代性”(或“反思现代性”),因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安全不确定性、生态灾难已无法再用旧的社会观点、制度来解决。——尤其是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大规模生态灾难和社会不平等风险威胁,已远远逾越了现代工业所内含的民族国

家的发展及其疆域边界的逻辑,反过来将侵蚀并且挑战民族国家体制的基础与统治管理能力。也就是说,现代工业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不仅只产生以民族国家为范畴的风险社会,而且更是由于这种风险的蔓延造成了世界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严峻挑战。

在休息之余,贝克教授对这个问题又补充道:对现实问题及其矛盾的反思和现有解释范式的困顿,促使对未来的忧虑,使我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构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印证了我的观点,产生了影响,学术敏感和热情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前瞻性吧!

2.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具有学术原创性。在采访乌·贝克教授时,我询问:“中国目前面临最大的风险和危险是什么?”贝克教授结合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及世界的冲击,认为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社会转型的巨大震荡,他特别强调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安全问题,是突显社会整体安全状况的一个缩影,也是未来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缩影。

谈论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西方学术大师和学者很多,很多人都是浮光掠影,泛泛而谈,往往是隔靴搔痒,不痛不痒。贝克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是切中肯綮,真正搔到了痒处。“压缩饼干”说既形象又妥帖地揭示出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险,且又具有原创性,恰如马克思所说的“夏夜吹来了一股凉爽的风”。

3.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具有学术问题意识。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说,一种理论和本质“与其说取决于思考对象的直接内容,还不如说取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他认为:“事实上,哲学的结构、问题,问题的意义,始终由同一个问题式贯穿着。”(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47页注2、第54页)受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启发,我认为前沿问题研究的学术问题意识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带着问题意识去发现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呈现的,进入研究领域、探询研究领域中的问题体系,提出解决研究问题的路径和方法。卡尔·波普提出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拉卡托斯“启发式”研究可能对我们研究前沿问题有所帮助。

4.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具有学术现实性,即现实关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

学术前沿研究报告

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61页)前沿问题的研究不应是“书斋里的革命”,应该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中去,做时代的弄潮儿。我认识的一个学者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身处在这个时代的学者,我们是不幸的,因为“前人之述备矣”;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遭遇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做出前所未有的学问来!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会起飞。时代呼唤学者去思考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矛盾。

基于上述思索和考量,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对当代学术前沿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和梳理,以期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这里汇编的文章大都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近年来的精华,另外我们还诚邀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南开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加盟,向外拓展“学术前沿研究报告”辐射的领域广度。将要呈献给广大读者的“学术前沿研究报告”系列丛书有7本,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前沿报告(2006—2007)》、《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6—2007)》、《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欧洲研究前沿报告》、《中国文艺研究前沿报告》。分7个报告若干个专题进行系统学术加工和梳理,形成研究报告的框架,以期能够把握当代中国与西方学术前沿的主流和趋势。挂一漏万,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是为序。

薛晓源

2006年10月23日于北京西单

目 录

文化研究

- 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徐 贵/3
论奇观电影与视觉文化 周 宪/21
媒体革命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危机 胡大平/34
高雅文化对通俗文化: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的讨论 ... [澳]西蒙·杜林/50
什么是群众?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格里访谈录
..... 尼古拉·布朗 伊莫瑞·泽曼/66

经典与经典重述

- 文学的重写、经典重构与文化参与
——杜威·佛克马教授访谈录 生安锋/83
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陈太胜/97
文本、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诉求
——谈歌剧《白毛女》如何成为“红色”经典作品 黄科安/110
“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读解 张 法/125

知识分子问题

- 知识分子和批评思考的视域
——W·J·T·米切尔教授访谈录 刘 禾/135
谁是知识分子?
——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 昌 初/153

中国文艺研究前沿报告

- 写作的姿态 孙 郁/163
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孟繁华/173

批评何为?

- 沉溺于消费时代的文化速写
——“先锋批评”与《秦腔》事件 肖 鹰/187
批判精神的沉沦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病因之我见 赵 勇/201
批评何为?
——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 吴义勤/212
批评的眼光、态度和风格 阎晶明/222

艺术现场

- 超越“亚洲性”与亚洲当代艺术 黄 笛/235
论当代艺术二十年 吕 澎/253
现实与理想
——从朝戈、丁方的绘画看当代艺术的人文精神 般双喜/269
艺术的神性维度
——论丁方的行一文一画 余 虹/284
关于艺术的历史与思想 朝 戈/302
对中国油画的价值重审 丁 方/307
传承与变革
——关于吴为山的雕塑 李小山/312
我看中国雕塑艺术的风格特质 吴为山/317
谁解枯蓬胜艳葩?
——重读李老十诗画 郎绍君/324
“新人类”现象在中国当代油画中的呈现 鲁 虹/339

文化遗产保护

- 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理论模式的比较研究 李 军/351
“第四世界”的文化遗产:一个艺术人类学的视野 彭兆荣/374

目 录

对话

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

——王安忆、张旭东对话 王安忆、张旭东/389

文化研究

徐贲

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周宪

论奇观电影与视觉文化

胡大平

媒体革命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危机

西蒙·杜林

高雅文化对通俗文化：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的讨论

尼古拉·布朗 伊莫瑞·泽曼

什么是群众？——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格里访谈录

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徐 贲

今天,博物馆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设施。在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普遍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构筑对特定民族国家群体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体身份。博物馆的诸种功能(搜集、保管、研究和陈列)都是为这两个目的服务的,其中的关键在于陈列。陈列是否具有说服力,决定着博物馆能否有效地使广大群体成员(首先是博物馆参观者)接受它所构筑的生活世界秩序和积极参与想象它所设计的群体身份。从博物馆所起的这种普遍作用,我们可以把博物馆看成是当今世界上诸多普遍性体制中的一种,就像各种宗教组织、民间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一样。全世界的博物馆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可以称为“全球”的体制联系。到20世纪末,博物馆的全球联系网已包括35000多个成员。博物馆间的国际组织之外还有博物馆学这个世界普遍认可的学科,这更使得博物馆具备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意义。

博物馆的全球化意义不仅在于其普遍体制,还在于它生动地体现着全球化特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博物馆在世界性作用和地域性操作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正是当今全球化的一种文化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强调为普遍的人类遗产,但是其会员国所强调的则是各自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性。这两种说法反映的正是全球化中普遍性和个别性之间的基本关系。一方面,社会和文化有独特性,但另一方面,普遍性终究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化解这一独特性。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之所以有价值,不仅仅因为它独一无二,更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其他社会和文化也同样看重的一些价值,因而被其他社会和文化所赏识和尊重。每一个社会和文化都以“过去”和“现在”的传承来构建自己的身份特征,但支撑它的“过去”却不能不放在全世界正在共同经历的“现在”。那些被想象为个别的“过去”也就因为当令人

类共同的“现在”而具有更高的普遍合理性。同样道理,不同国家和社会中的博物馆在构筑特殊生活世界秩序和群体身份时,也是从一种现时的普遍世界秩序和人类群体身份来获得普遍合理性的。

一、博物馆和生活世界秩序

从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历史发展来看,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过程是和资本主义推动全球化分不开的。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全球化理论来说明这个过程。第一,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一波又一波历史性冲击所积累的结果。第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全球化为人们在想象局部生活秩序时提供必不可少的“全球秩序意象”,而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想象性的局部生活世界秩序。提出这两种理论的分别是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和罗伯逊(R. Robertson)。

马丁·普洛斯勒(M. Proslor)曾把第一种全球化理论直接运用到他对博物馆和全球化关系的研究中去。普洛斯勒把博物馆构建世界秩序的作用历史性地追溯到它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形成的特殊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借助物品”来形成一个“实现、理解和传递”世界意识的“认识空间”^①。他指出:“这个经过五百多年而臻于完善的作用形成了当代博物馆高度一致的基本结构。正因为如此,博物馆才在全球性的思想和形象散布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②在全球化的今天,表达世界意识作用特别显见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历史博物馆。作为第三世界博物馆学重要论坛的“博物馆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这样说明博物馆的作用:博物馆必须在世界文化快速变化中加强自己的文化意识,在国际化的国家体系中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性发展中,发挥自己特定的社会教育作用^③。博物馆的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建立在一种全球性或世界性的秩序意识上的。

作为群体生活秩序的认识空间,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是从欧洲向欧洲外围、再向世界其他地区(外围的外围)一波一波地逐渐实现的。15 和

① Martin Proslor, “Museum and Globalization”, in Sharon Macdonald & Gordon Fyfe (eds.), *Theorizing Museums*,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22. 他运用的是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在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提出的全球化理论。

② 同上书,第 22 页。

③ 同上书,第 22 页。

16世纪最早的博物馆出现在欧洲当时的首都城市，如佛罗伦萨、马德里、巴黎和伦敦。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与资本主义第一波全球扩展同步发展，博物馆扩展到了“欧洲的外围”。第一批非欧洲博物馆出现在白人定居的殖民地。北美的第一个博物馆于1773年在查理城开馆，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博物馆于1821年在悉尼开馆。在拉丁美洲，第一个博物馆于1815年出现在里约热内卢；在非洲，第一个博物馆于1825年出现于开普顿。在这一时期中，在白人殖民定居之外建立博物馆的只有Batavia(今为雅加达)(1778)和加尔各答(1796、1814)。在白人殖民定居处的首批博物馆建立后，不断有新的博物馆出现，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则在差不多五十年以后才有新的博物馆出现。这种情况在亚洲也是一样，博物馆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英国殖民地区域：马德拉斯(1851)、卢科瑙(1863)、拉合尔(1864)、马杜拉(1874)和科伦坡(1877)等等^①。

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博物馆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空白才逐渐得到填补。在印度和荷属东印度之外的亚洲博物馆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建立：日本(1871、1877)、曼谷(1874)、朝鲜(1908)、金边(1917)、乌兰巴托(1921)、喀布尔(1922)等等。非洲的第二个博物馆是在建造苏伊士运河期间于1863年建立的，其后又陆续有博物馆建立在奥兰(1884)、突尼斯(1889)、马达加斯加(1897)、罗德西亚(1901)、乌干达(1908)、肯尼亚(1909)、莫桑比克(1913)。在拉丁美洲，博物馆陆续建立在古巴(1870、1899)、哥斯达黎加(1887)、巴拿马(1903)、阿根廷(1888、1889、1895)。1905年由张謇在南通创立的中国第一个中国人办的博物馆就是这一波博物馆扩展中的又一个例子^②。

普洛斯勒在运用欧洲资本主义对世界一波又一波冲击的理论时，把1905年中国人办的第一座博物馆当作一个欧洲之外发生的事件。然而，仅从博物馆设施的传布来理解欧洲资本主义对19世纪中国的那一波冲击还是不够的。欧洲资本主义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冲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上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物品优势以及基于此的国力优势，强迫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对自己和世界关系的看法。博物馆以域外物品的展示来打破中国传统的封闭视界，使中国接受一个比它自己要广大得多的世界图景。用罗伯逊的话来

^① Martin Proslor, “Museum and Globalization”, in Sharon Macdonald & Gordon Fyfe (eds.), *Theorizing Museums*,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24. 他运用的是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在*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提出的全球化理论。

^② 同上书，第25页。

说,博物馆的作用是改变中国的“世界意象”(world image)。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物馆能起到当时维新人士所极为期望的开启民智作用。

中国首先注意到近代博物馆的人是徐继畲。1848年他所辑著的《瀛环志略》一书,介绍了各国地理、历史以及风土人情。在卷五、卷七的“普鲁士国”、“西班牙国”和“葡萄牙国”各条,都提到那里有“军工厂”和“古物库”,即这些国家的军事博物馆和历史文物馆。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的博物馆是由西方人办的。1868年法国耶稣会士P·厄德(中文名韩德,又名韩伯禄)在上海创办徐家汇博物院,藏品主要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动植物标本,1930年以后划归同属耶稣会的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建亚洲文会博物院(亦称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由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办,藏品大部分为中国物品,也有东南亚地区的物品。主要藏品有鸟类、兽类、爬虫类等自然标本,另有部分古文物与美术品。中国人创办博物馆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配合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设立的。1876年京师同文馆首先设博物馆。1877年后,上海格致书院建“铁嵌玻璃房”博物馆,陈列有英国科学博物馆及比利时等国捐赠的各种科学仪器、工业机械、生物标本、绘图照像、水陆交通、天文地理、枪炮弹药、服饰等样品或模型,以供学生观摩,并对外开放。

19世纪90年代,博物馆明确成为国家政治变革计划的一个部分。康有为在《大同书》(1885年完稿,1902年作最后修订)中,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博物馆的理想。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也提到办“博物院……以开民智而悦民心”。1895年,维新派建立的上海强学会提出四项“要务”,建设博物馆即是其中一项。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说,欲振中国,须兴学会,而学会有十六件大事要办,第十二项是“开博物院”。1898年夏天,光绪帝批准康有为所上的《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内有建立博物馆的建议。其后,由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①。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中国,博物馆成为罗伯逊所说的那种“世界政治的文化聚焦”。罗伯逊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心文化和政治的结合。在他那里,文化性的世界意象和政治性的世界秩序是密不可分

^①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王宏钩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5—8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第42卷,“文物”条、“博物馆”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8—749页。

的。不同群体可以持有不同的世界意象(即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不同的世界意象无一不是为了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如何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逊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要对人们常说的世界政治采取文化聚焦”,文化聚焦的一个重点就是关注不同的群体想象什么样的“世界意象”(即世界秩序),因为“世界意象在人们决定如何追求(思想和物质)利益时起着决定作用”。^①

二、世界意象和现代民族国家

中国最初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外来压力下被动形成的。当英国把《南京条约》强加给中国的时候,在一种似乎是一国与另一国的国际关系中,中、英两国民族国家意识和体制其实并不处在同一历史发展的水平。盖里特·贡曾指出,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进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其中有一个“两个步骤的过程”:一是国际关系,二是现代国家体制。欧洲国家早期与非欧洲国家所签订的条约(如《南京条约》)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同时涉及了国际关系和国家体制。前者如保障外籍人士的生命、自由、财产,后者如处理涉外事务的政府制度和政府机构。综合二者便有了国家政府遵守国际外交惯例、遵守国际法原则等规定^②。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从19世纪开始在国际法著作中得到了越来越明确的表述。国际法所带来的国家主权意识使得中国得以用欧洲的外交原则和国际法来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在中国新世界意象(即国际政治秩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国际关系意识和国家意识其实是同时发生的。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专管外交事务的正式的政府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被称为“中国外交关系史上的转折点”^③,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体制性变化,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正式放下对“番邦”的那种惟我独尊的身段,接受了与它国平等的地位。1862年设立的“同文馆”从属于总理

^①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 4ff, 50ff.

^② Gerrit W. Gong, “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Hedley Bull &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84, p. 179.

^③ Masataka Banno,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